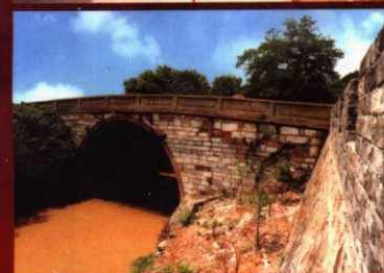


镇江文史资料

镇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



镇江文史资料

第三十五辑
(内部资料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江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二〇〇二年九月

目 录

· 往事回眸 ·

- 参加新四军二师地下交通线工作始末 杨瑞彬 (1)
-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的一些情况
..... 杨方盛 (5)
- 《江苏新闻》的台前幕后 张连莹 (12)
- 偕苏联专家选厂址 郭振邦 (18)
- 窥 求
- 记我参加的国防科研工作 张典焱 (21)
- 随中央电视台在镇江、扬州拍摄《传邮万里》记事
..... 张锦泉 (57)
- 参加三峡考古会战的的日子里 肖梦龙 (65)

· 史海钩沉 ·

- 镇江人民迎接解放的斗争和镇江的接管与初步改造
..... 莫仲钧 (78)
- 记默庵藏书始末 孙金振 (101)
- 解放前镇江的私立小学 吴大宽 (105)
- 忆五十多年前徐鸿培在镇江演出京剧的盛况
..... 顾厚培 (117)

· 人物春秋 ·

- 中国的“摩根”——陈光甫……………李植中(120)
- 中国现代冶金之父——周志宏……………史 勤(147)
- 怀念汪洋同志……………向锦江(158)
- 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……………赵家莲(165)
- 沙老师……………范 用(181)
- 流光容易把人抛……………仲宝麟(190)
- 追念张海澄先生……………夏 镇(195)
- 哀思绵绵忆故人
- 回忆我的父亲王宗槐……………王 曼(201)
- 忆刘淑华老师家访……………童文经(206)
- 从圖山走出去的女科学家胡玉梅……………王 冰(210)
- 知音君子 其垂意焉
- 杨明照先生及其弟子与镇江……………李金坤(218)
- 南社诗人姚鹓雏与镇江……………陈定武(224)
- 嫉恶如仇抓小偷……………胡雪林(229)

· 纪念抗日战争爆发 65 周年 ·

运用世界语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行

——记老世界语者符恼武的一段史实

……………符 彦(238)

一部用血和泪写成的民族痛史

- 读陈斯白著《野兽在江南》……**嵇钧生**(244)
徐解巷人民抗日壮举……**戴成强**(266)

· 抗美援朝中的镇江人 ·

- 镇江工商界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点滴……**胡鲁璠**(272)
拥军优属激励着前线战士的心……**朱遵义**(277)
抗美援朝的片断回忆……**殷德庆**(281)
三打“三八一”目击记……**姚素**(283)
抗美援朝散记……**成貽顺**(291)
征人万里乡情浓……**朱遵义**(303)
我为抗美援朝义演……**王筱堂**(315)

· 政协统战工作 ·

- 政协工作杂忆……**明光**(318)
春风化雨情满人间
——落实各项统战政策纪实……**吴新亚**(323)

· 其 他 ·

- 民国人像纪念银币杂谈……**宋志成**(338)
后记……**编者**(341)

参加新四军二师地下交通线工作始末

杨瑞彬

1940年3月，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。翌年春，为秉承日寇旨意，汪伪在长江下游苏、浙、皖、赣等省“清剿”，企图扼杀我新四军抗日力量，并对粮、棉、盐、药品和一系列军用物资加以控制，严禁出境。各交通关卡哨口，设置了许多大大小小的“检问所”，连行人都必须随身携带“良民证”，否则会惹来横祸。

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，我新四军二师曾多次派员进入敌占区开展工作，但均未奏效。1941年二师又派芮博威、程新生到南京组建地下交通线，采购、护送药品和无线电器材，为我方人员进入南京从事情报、策反等提供方便。芮博威到达南京后，找到了他的姐夫，当时他姐夫在南京太平路小火瓦巷口开设商务图书文具店，芮在那里落了脚，以该店伙计身份作为掩护。不久又与过去曾在苏南新四军一支队的同事王怡（王再春）接上了关系。当时王因与组织上失去联系，考进汪伪中央警官学校（三期本科生），利用这种身份，便于协助芮工作。王再春与我同班同学，又都是学生中的班长，相处

甚密，彼此了解，很快我就被吸收为地下交通线的成员。后因工作需要，又在三期本科中吸收了马骏一人，四期本科中吸收了王扶中、王煦春二人。我们五人的任务是护送二师所需的药品及军用物资配件。为避免校方的注意，我们利用假日、星期天，将物资安全地从城中运送出下关的浦口。由于我们身穿警服，又熟悉日语，避免了敌人的盘查，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有时还主动地向岗哨打招呼，他们误以为警校之物，得以顺利通过。此外，我和王再春常利用轮流值星（值班一周）、监厨（监督厨房炊事及外出购物）之便，与芮博威保持联系。

1942年夏，警校三期本科学生至汪伪首都警察厅中区警察局实习，主要科目为户籍管理，核发“良民证”（身份证）和交通指挥、巡逻等业务。我带领的一班同学被分配在龙王庙分驻所实习半年，该所地处太平路、大行宫、洪武路、白下路等繁华地区，旅馆林立，商店栉比。芮博威的书店亦在我实习的辖区之内。同时我又兼任中区训练义勇警察（类似自卫队）的军事教练，因而与外界的接触面较广。我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有意识地结交了一批店员、小老板、旅馆职工等，建立了友谊，从而为地下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时值二师不断派人进入南京从事情报、策反工作。他们没有通行证（良民证），难以通过关卡入城，也就根本谈不上开展活动了。所以从设法安排户口、领身份证，都必需由我亲自办理，

一关一关地通，防止发生意外。有时他们住进旅馆，还得向职工打打招呼：“亲戚跑单帮（做小生意），多请关照。”有时干脆在旅馆里聊天。每次警察来查户口，惯例查当天新住户，问职工是否今天接了新客，他们皆回答全是老客，向警察递上一支香烟了事。有时看到我在那里，仅坐下喝杯水，同我拉拉几句闲话，连登记本都不看就背着枪走了。在此实习期内我二师工作人员进入本地区，从未出过任何问题。

南京是汪伪的首都，地处南北交汇之处，沪宁线一带是汪伪政权的腹地，经济发达，人口密集，因而成为几个方面争夺的重点地域，斗争相当复杂。日伪方面企图将这里作为“以战养战”的基地。国民党虽然一再遭到汪伪特工的打击，但在沪宁线上仍有一定势力，南京也是他们活动的中心。新四军挺进江南后，力量日益壮大，直接威胁到汪伪政权的统治，甚至南京郊区也有了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。因此，南京汪伪特工花了很大的精力对付新四军，采取离间、策反、围剿等一系列手段，企图扑灭人民革命的烽火。

1941年秋，汪伪特务头子马啸天指使该部的情报科，用金钱收买了新四军二支队的情报处长陶季尘。陶投敌后，专门建立了新四军二支队的内线组，陶任组长，并搜罗了一小撮叛徒。

1942年9月，二师南京地下交通线负责人芮博威和陈新生在芜湖被捕。同年初冬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

由南京特工区区长马啸天亲自出马，向警校校长邓祖禹交涉，最后我和王再春被黑牌汽车押送至一处戒备森严的秘密监狱里，后来方知此地为宁海路段的普陀路8号专关押政治犯的地方。在狱中“放风”时，又看见马骏、王扶中、王煦春，方知他们也被捕了。被捕后，经多方营救未果，据说我们关押的“号子”都属死刑。最后还是中央警校老师董健吾，得悉敌人尚未掌握到我们的确切材料，我们又始终没有吐露真情，几经周折，终以新四军嫌疑犯的罪名，由学校具保释放。后日寇侦悉此事，甚为恼火，欲加害董健吾，董得悉，连夜只身匿沪。

董健吾即为斯诺《西行漫记》中提及的王牧师，随陈赓出色地严惩叛徒，在上海营救保护过一批中共领导同志的子女，包括毛岸英、毛岸青……是一位老地下工作者。

由于芮博威的被捕，董健吾的突然离去，我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，二师南京地下交通线工作也就无形中解体。直到解放战争中，我重新参加了中共南京市委（地下）所属镇江工委所领导的地下工作，从事情侦、策反工作，直到镇江解放。

我所知道的国民党

江苏省政府的一些情况

杨方益

《镇江文史资料》第29辑载有朱伯和口述、范广炎记录的一篇回忆资料亦即此题。笔者当时正在盛年，一直服务桑梓，耳闻目睹及直接间接之接触，可勉为较系统叙述以作补充和更正。

当年国民政府对于各省省政府之建立和改组，例由行政院提名9人至11人为省政府委员，并于其中指定省主席和各厅、处、局长（不设副职，故均各为一人），报请国民政府主席明令任命。实则是事先早由蒋介石决定了省主席人选，并令其“组阁”，提出委员及兼任厅、处长名单，由蒋审阅同意后，交行政院聘请国府主席任命以完成手续而已。

各省政府都必设五大厅、处，即民政、财政、建设、教育四厅和保安处，习惯称“民、财、建、教、保”，有人戏称之为“穷、凶、急、恶、狠”，竟常常在谈话中以之代替了。“穷”是指教育厅，教育经费不足，特别各县多有拖欠穷教师薪金的情况，上下终年喊“穷”。“凶”则指民政厅，各县公安局长均由其直接委派，多

是使人害怕的凶神。财政厅则占“急”字，经年累月，忙于开源节流，总难应付各方面需求，也就经常发“急”。建设厅为拓宽道路、清理河道，势必强行拆迁房屋，取缔棚户，更常常为筑路浚河强制征工等等，都觉其“恶”极。保安处是军事机构，有逮捕镇压之权，自然占“狠”字了。这五个字虽属于戏谑，倒也颇为形象的。

省府除必设上述五大厅、处之外，有时因业务、事务的需要，可呈请行政院核准增设专业厅、处、局，其厅、处、局长，有的是由省府委员兼，也有的是另行专职任命的。省府委员中有的不兼任厅、处、局长，其职称也就是“省政府委员”，习惯上常被称作“光杆委员”，久而似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职称。这种光杆委员除每星期二、五两次参加省政府例会讨论政务之外，几乎没有别的工作，故极其清闲，悠游自得。他们往往只是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、其他要人或即省主席需要安排照顾的人士，等于领取乾薪。因而他们有时可以离开几个月，甚而长期居住家乡或别地，工资按月照领。抗战前省政府委员是拿简任一级薪金，每月 650 元，外加公费 560 元，合计 1210 元；省主席、厅处长都一样拿简任一级薪金，公费则略有不同地增加。再说，省府及各厅、处最低级委任十二级的录长，专习缮写、刻油印，月薪为 45—60 元。再下县级机关的录事，最低的仅 20 元甚至 16 元。不过当年物价廉而稳定，这最低级薪金尚可维持五口之家的简单生活，于此也可想见那些“光杆委员”是过得何等

悠闲而豪富的生活了。

省政府主席和委员没有固定任期，认为必要时进行改组，前一届全部免职，重新任命后一届。这样，前后届并无连接关系。朱伯和口述中说：“省府迁镇不久，钮（永建）不做主席，由叶（楚伧）升任。”这样提法不确切，因当时省府是改组，重新任命，叶楚伧不是由秘书长升任主席，而是另起炉灶。而且当时叶楚伧是国民党中央委员，还兼任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（相当于政治局）秘书长和江苏省党部常委兼秘书长，并不比省主席职位低，都谈不上“升任”。

关于江苏省政府历任主席，朱所口述：在叶楚伧之后，“……顺次为顾祝同、陈果夫、王懋功”。钮、叶、顾、陈相继，是符合史实的；但陈果夫和王懋功之间，情况特殊，相隔好几年，还有几任呢！

在1937年11月镇江沦陷前夕，笔者率眷流亡金坛直溪桥，这时省府亦撤至苏北扬州，进行改组。陈果夫去职，由顾祝同再任。以后曾由驻防军人韩德勤、李守维先后继任，并撤至兴化、泰州一带。最后，省政府已难在苏北立足，不知何时，于安徽阜阳成立“流亡”的江苏省政府，由王懋功任主席，并曾于安徽屯溪成立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，由刘秉哲任主任，分别遥控江苏省未被日寇占领县份，并委派一些沦陷区的地下县长，组织地下县府活动，直至民国34年（1945年）日寇投降时。故陈果夫和王懋功两任并不顺次衔接。

8月份日寇宣布投降，省府主席王懋功率所属作些准备和部署，旋迁往苏州接收汪伪系统省政府，至11月份才能到镇江复员、正式组府，恢复各厅、处、局等建制。淮海战役失败后，省府改组，由丁治磐继任主席，直至1949年4月镇江解放。

关于历届各厅、处、局长，兹就所能记得的分列于后：

民政厅在钮任主席时初为茅祖权任厅长，以后为缪斌（此人在任时卖官鬻爵，声名恶劣，以后沦为汪伪汉奸，抗战胜利后被枪决）。叶任主席时为胡朴安。顾任时为赵启霖。陈任时初为辜仁发，似因有历史上的桃色案被人攻击离任，后由余井塘继。省府撤苏北时不详。抗战胜利后王任时为王公珣，丁任时为沈鹏。

财政厅厅长，钮、叶两任均为张寿镛，顾任为陈其采，陈任为赵棣华，抗战胜利后王任时为董辙，丁任时为奚某（忘其名，知字勉之）。

建设厅厅长，钮、叶两任均为王柏龄。顾任初为孙鸿哲，因适遇苏北大水灾，孙和所属水利局长茅以升被无理攻讦，辞职去任，由沈百先继。陈任为董修甲（此人以后也参加汪伪组织）。抗战胜利后王任为董赞尧，丁任为钱振泰。

教育厅当省政府在南京及初迁镇江时，还实行“大学区制”，忆以第四中山大学兼管江苏（似还有浙江）教育行政，校长张乃燕，亦系省府委员之一。以后仍设

教育厅，厅长陈石珍。顾、陈两任均为周佛海（闻撤至苏北初期仍为周佛海，以后为马元放。周后系汪伪政府的第三号汉奸头目，是人所共知的了）。抗战胜利后的两任记不起来了。

保安处在钮、叶两任时的处长记不清了，叶任可能已是李明扬。顾任为李明扬，陈任为项致庄（抗战时投奔汪伪，曾任伪省长于浙江）。抗战胜利后王任为贾酩山，丁任时已无印象。

于此顺便提一下保安司令部问题。记得曾看见过一个资料提到：江苏省曾撤销保安处而建立保安司令部。据笔者所知：国民党的省政府主席一直都兼着省保安司令的名义，而保安处长也都兼着省保安副司令的名义。是为了遇有突然事故、发生紧急情况时，可以采取特别措施，可以调动境内军、民武装应变。这也类似清代封疆大吏的总督都兼着兵部尚书衔、巡抚都兼着兵部侍郎衔一样，是经常兼差而非临时任命，也不另建立司令部实体组织，而以保安处为必要时的办事机构，也从未因设保安司令部而撤销保安处。

江苏省政府除上面所述常设的五大厅处之外，在抗战前钮任、叶任时曾设有农矿厅，厅长何玉书，是省府委员兼任。以后农矿厅裁撤，其职掌并归建设厅主办。

抗战前曾设土地局，后改地政局，局长祝平，抗战胜利后局长张辉，均系专职。

抗战胜利后增设社会处，将原属建设厅职掌，指导

监督民众团体、监督管理合作事业等划归社会处负责。处长钮长耀，系省政府委员兼任。丁任主席时，社会处工作已陷于停顿。

抗战胜利后又增设田赋粮食管理处，处长何玉书，系专职。

此外，江苏省政府及各厅处还有一些设于镇江的直属机构，例如民政厅的警官学校、省会警察局、省会救济院，建设厅的省公路局、水利局、省会建设工程处等等，已难以回忆列举了。

朱所口述，还有两个问题，需加以澄清：

第一，朱说“省府有二处、五厅、一委员会”。其所说二处是指秘书处和保安处。又说：“秘书处设秘书长，下面有秘书……”。其实，保安处和秘书处性质不一样，不能并列为两个处。保安处是省府领导的下级独立机构，和各厅一样，颁发有印信，可以独立行使职权，可以签发上行、平行公文及发布命令、布告。而秘书处则是省政府内为省政府及主席的办事机构，没有正式印信，其所拟公文、命令、布告，只能以省政府及主席的名义行之。秘书长是省政府秘书长而不是秘书处长，是省政府和省主席的幕僚长，协助省主席督率秘书处各科办事，也可兼及各厅、处、局政务，但无权对上级、平级及下级直接行文、发布命令。所以不能将保安处和秘书处并立为二处，秘书处根本不能作为独立机构，如秘书处为所属独立机构，则省政府本身只剩空架子了。

至于“委员会”也不能和各厅、处并立，一般都是为临时的需要而设立的。如朱口述的“土地整理委员会”以后因土地（地政）局的设立就撤销了，其他如设过劝募公债委员会、禁烟委员会，甚而在其临近崩溃时，还设过“战乱建国委员会”，这些临时性组织，并非正式建制，是不能如朱所口述“二处、五厅、一委员会”的提法的。

第二，办公地点问题。朱所口述七条，因其非本地人，本不熟悉，因而都不够确切，甚至颇为错误。例如所说“教育厅在现在的三五九医院对面，原夫子庙内”（镇江对此处称“府学”，从不称夫子庙），其实那时教育厅即在原府学，为现三五九医院的东部分，在中山东路之北，而不是“三五九医院对面”，那就要在中山东路之南了。又如说“建设厅在市政路，现河滨会堂对面”。河滨会堂已拆建，原址是现华联商厦的西北角部分，其对面为省田赋粮食管理处，均在中山东路之北，市政路的两边。而当时建设厅实在中山东路之北，为原江苏省立第九师范旧址，解放后为军区房地产管理单位。现拆建为商业大厦之东首部分及京口物资大厦等一片，其后门直达八叉巷。

《江苏新闻》的台前幕台

张连莹

《江苏新闻》创刊于1948年春，发行于当时的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镇江，由永祥印刷公司承印，是一份有特色的16开版半月刊。

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要出任何报刊，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头面人物做靠山。而《江苏新闻》的靠山便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常委兼宣传部长扬州人凌绍祖。当时他已拥有一份《江苏省报》为机关报，为了进一步扩大他的宣传阵地和舆论实力，便请他的同乡江行担任《江苏新闻》社社长，并且紧锣密鼓地粉墨登场，在江苏省的新闻天地中异军突起，以报导“内幕新闻”为能事。从正面看，是一份揭露黑暗、反对腐败、痛击时弊、足以使贪官污吏闻风丧胆的刊物；但从侧面看，也是一份拉帮结派、排斥异己、唯我是从、壮大个人实力的工具。自发行以来，拥有很大的声誉和更多的读者。这是因为，当时的报纸十之八九是国民党的御用报纸、“中央社”的应声虫、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力竭声嘶的吹鼓手，甚至是欺骗人民大众的“造谣公司”。例如，明明淮海战役溃不成军，吃了败仗。“中央社”发布的信息